

目 录

我和民主同盟……………叶笃义 (1)

- (一) 我参加民盟的原委
- (二) 筹组民盟华北总支部
- (三) 在国共和谈阶段我在民盟所起的作用
- (四) 伪国大召开之后至民盟被迫解散之前
- (五) 民盟被迫解散的前后经过
- (六) 民盟被迫解散之后至上海解放之前
- (七) 全国解放之后
- (八) 结束语

我和罗隆基……………叶笃义 (38)

我同罗隆基建立友谊的开始——我同罗隆基开始建立工作关系——由二中全会到总部解散这段期间——由民盟解散以后到上海解放这段期间——解放以后罗隆基的小集团——我在小集团里起了什么作用——小集团的瓦解——我参加土改回来以后——现在我同罗隆基的关系

我和张东荪……………叶笃义 (53)

我同张东荪是怎样认识的——我同张东荪1938年去汉口——张东荪的多方面关系——张东荪和王定南被日本拘捕——1943年我到解放区——1943年我同张东荪见过一个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1944年我到重庆参加民主同盟——成立民盟华北总支部——我参加民盟工作——

解放以前张东荪给我的经济支援——解放以后我和张东荪的关系

我和张君勱……………叶笃义（67）

1944年我到重庆会见张君勱——1946年在重庆重会张君勱——张君勱约我参加民社党的成立大会——我替张君勱做了些什么事情——关于1946年11月第三方面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张君勱参加了伪国大，我脱离了张君勱

我和司徒雷登……………叶笃义（74）

毕业以后——我怎样走上美帝国主义的门路——张君勱怎样参加伪国大——我继续跟着司徒雷登走——司徒雷登怎样对待民主同盟——进一步做工作——摸底和分化——揭掉了“教育家”的假面具——关于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不择手段地制造谣言——在革命阵营中制造代理人——“别了！司徒雷登！”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概略……………许闻天、

邓昊明、金绍先、湛小岑、杨玉清、宁光堃（92）

前言

- （一）孙盟的组织概况
- （二）孙盟的政治纲领
- （三）孙盟对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斗争
- （四）孙盟策动在香港的部分国民党人员起义的经过
- （五）孙盟宣告自动解散和参加全国政协的经过
- （六）结束语

我在立法院参与孙文主义

革命同盟工作活动纪略……………金绍先 (129)

反对“戡乱”，主张和平——提出征收财产税法案，反对豪门资本——反对轰炸开封案——主张废除总裁制——废止《动员戡乱临时条款》的提案——反战主和——促使蒋介石下台、支持李宗仁上台——同特务逮捕许闻天、金绍先作斗争——和谈破裂后的最后斗争——同立法院死硬派幽崇杨玉清作斗争

入越受降的片断回忆……………陈修和 (144)

前言

(一) 中越关系问题

(二) 华侨问题

(三) 中越文化交流问题

(四) 中越两方国内派系斗争和中国人员在越作风问题

(五) 中越联合对付法殖民者的货币斗争

(六) 调停越南各党派的全国大选

(七) 国民政府与法国签订的“中法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问题

(八) 中越边界和西沙群岛与秦象郡关系问题

(九) 越南古史和越南民族起源的研究

附：

胡志明致陈修和的亲笔信

越南学者阮文做致陈修和的亲笔信

胡志明与武元甲赠给陈修和的名片

历史照片两帧

我和民主同盟

叶 笃 义

这不是在写我的自传。今天在切除结肠癌手术之后，有生之日或多或少在所未卜之际，清理一下自己大半生的事，却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在我一生的事迹中，同民盟的关系自然占绝大的比重。我实事求是地把它写出来，不是准备发表的，而是为研究盟史的同志们提供一个侧面参考资料。

以下资料以我为中心来谈，凡我所接触到的都要说一下。我没有参预的事，则无从谈起。我从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过去保存的少数文件材料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丧失殆尽。因此只能根据记忆写出，想起来的就写，想不起的绝不牵强附会，不夸大、不缩小。写历史资料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绝不因当前的政策需要而取舍过去的历史资料。

（一）我参加民盟的原委

1943年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民盟这样一个组织。大

约是1943年的6、7月间，张云川从重庆来到北平，住在前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家。他携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等文件，通过吴雷川见到张东荪，约请张参加。张东荪遂于1944年初托我到重庆代表他通过张君勱参加民主政团同盟。临行之前，张还将他写的一本谈关于所谓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书（具体书名我记不起来了）托我带到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并签名送一稿本给周恩来和张闻天。

我1944年3月间由北平到达重庆，首先见到张君勱，向他陈述一切经过。张君勱说政团同盟将于当年九月间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取消“政团”二字，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容许并欢迎无党派人士个人参加。从3月到9月我呆在重庆，参加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所谓“小民革”）。我准备参加行将改组成立的民主同盟，是取得了小民革的同意的，而我参加小民革则是瞒着民盟人士的。

1944年9月19日，在重庆鲜英的住宅（名为“特园”）召开民盟全国代表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我的入盟介绍人是张君勱和章伯钧。会上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和《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宣言》，并选出三十三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左舜生的操纵把持下，所有议程一天之内匆匆完全通过了。会后我找到张君勱提出意见。

（1）三十三个中央委员中，青年党人为什么占那么多？

(2) 会上决定派郭则沉到陕西筹备成立西北总支部，派我到北平筹备成立华北总支部，为什么郭被选为中委而我却不是？张君勱马上找左舜生谋求补救。于是隔了一天在9月21日又继续举行一次会议，增选了三个中央委员：董时进（是当时所谓农民党主席）、蒋匀田和我。这次会议议程只此一项，匆匆几分钟即结束。以上就是我参加民盟的经过。

(二) 筹组民盟华北总支部

1944年9月21日民盟全国代表会议闭幕，我和郭则沉即积极准备离开重庆分赴西北和华北。我们于10月间搭伴同行到达西安。郭则沉是陕西人，在西安人事关系很多，他把我安排在工商界上层人士韩望尘（解放后曾任陕西民建、工商联负责人）家中居住，同杜斌丞、杨明轩等人会面。彼时，周鲸文适在西安，准备到北平。我于是同周鲸文一起，通过杜斌丞的关系，得到国民党军界上层人士高桂滋的介绍信，介绍我同周经过阎锡山的防线从山西太原返回北平。同行者还有一个名字叫董秋水的人，他是周鲸文的随从人员。

我同周鲸文当年底到达北平，随即同张东荪、曾琦（彼时正在北平）等人筹建民盟组织。约在1945年4、5月间成立了民盟华北总支部的组织，张东荪、曾琦、林可

玕（青年党人）、周鲸文、张云川和我为委员。张东荪任主委，林可玕兼任组织工作，我兼宣传工作。彼时北平还在日伪的统治之下，民盟组织成立了，但并未展开什么工作。同年8月间日本投降之后，民盟才开始发展盟员的。由于林可玕是组织委员，因此发展进来的多是青年党人。为了抵制起见，张东荪和我介绍一个名字叫殷之铎的参加进来。殷是一个当时在北平专同张东荪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海关总署副署长）。我带他到林可玕那里办理入盟手续。他用“殷冷”（大致是这两个字）的名字填具了入盟申请表。但后来有人不慎把他的身份暴露给林可玕。我知道了之后急忙把这件事告诉了殷。殷非常生气，因此他办了入盟手续之后，即从未参加盟的任何活动。不久之后，曾、林二人不告而别离开北平到达重庆，民盟的华北组织随之解脱了青年党的影响。张东荪在这个时候在北平办了一个《正报》，由许宝騄任主笔。我记得我曾在报上写过两篇社论，其中一篇谈到，中共应当有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这篇文章曾获得当时中共地下人士的赞赏。1946年3月我由北平飞到重庆参加民盟中央工作。从此我即离开北平一直到解放之后才又返回，当中只在当年11月间飞来北平，3日后又回到盟中央。这段情况随后再叙。

(三) 在国共和谈阶段我在民盟所起的作用

从1946年初到当年11月中伪国民大会召开这一段时间是国共和谈阶段。我1946年3月到达重庆参加民盟中央工作。最初我的任务是协同罗隆基接待外国新闻记者。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准备“还都”。民盟也忙于准备将总部由重庆迁至南京。9月间民盟派我和罗子为先到南京筹备建立总部地址。我们两个人是搭中共的专机同去南京的，同机前往的人有董老、李维汉、陈家康、张晓梅等，除了我和罗子为而外完全是中共人士。该机在重庆沙坪坝刚刚起飞就降落下来，再度起飞再度降落，三起三落，最后发现飞机引擎的某部分有一小石粒。董老为此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最后董老由马歇尔的专机送至南京。其余人士则陆续三三两两分搭民航机飞至南京。现在分别就如下几个方面试述：

(1) 同美国人的联系

在国共和谈阶段代表民盟同外国人士接头的为张君勱（盟中央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和罗隆基（盟中央宣传部长）。他们两人互不合作。罗在同外国人接触中说过张的什么坏话我没有听到过。而张则通过我向马歇尔和司徒雷

登说罗好出风头，好说大话，代表民盟做国际联系的是他而不是罗。在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心目中，张君勱的份量大大超过罗隆基。在这一阶段我还帮助张君勱做了如下丧失立场的事：

张君勱是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成立的宪法草案小组的召集人。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根据协商会议拟定的宪法修改原则拟出具体宪法草案来，交由宪草审议委员会通过后提交行将召开的国民大会采纳。张君勱在1946年8月间拟出一个宪草初稿来，这个初稿并未经过宪草审议委员会（由参加协商的五个方面——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所谓社会贤达——每方面推五人组成）的讨论通过。他叫我把他拟出的宪草译成英文，并代他起草了一封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将宪草译稿附去征求杜鲁门的意见。信及附件是由我交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寄去的。这件事是张君勱背着民盟干出的，而我也从未向民盟交代过。

在这一阶段中，张君勱同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接触多半是同我一道去的。马、司二人对张君勱寄很大希望，鼓励张通过民盟把国共以外的所有第三方面团结起来。用马、司二人的话来说，一方面可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一方面可以孤立共产党。自然，前一句话是虚而后一句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张君勱当时飘飘然，自以为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靠山，这对他以后决心脱离民盟参加伪国大有很大的影响。

（2）我参加了民社党的成立大会

民社党原是由国社党与民宪党合并而成的组织。国社党全名是国家社会党（与希特勒的德国纳粹组织同名），民宪党的全名是民主宪政党（原是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时成立的保皇派组织）。1946年6月两党在上海决定合并，召开了成立大会。彼时我正在上海国社党部居住。原因是我在南京下关惨案时被毆伤，久不复原，南京民盟总部居住和生活条件很差，张君勱约我到上海宽敞的国社党部里居住疗养。我并非国社党员而只是同张君勱有师生的关系（我在北平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张在那里教书）。我在上海一方面疗养，一方面帮助张君勱起草一些外文稿件。上面所说的那个宪草译稿及致杜鲁门的信件就是这个时候搞出来的。

国社党内原有许多人想拉张君勱脱离民盟走青年党的路投靠国民党，想借机会在民社党成立大会上通过一个决议，退出民盟。但当时国共和谈尚未完全破裂，张君勱认为占着民盟这样一个牌子，无论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上总比完全站到国民党那一边去的青年党好看得多。他于是事前做工作，叫已经参加了民盟并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的国社党分子蒋匀田、孙宝毅等人在会上发言反对退出民盟。为了增加力量，张君勱叫当时住在国社党总部但并非国社党员的我也参加大会。他的这个提议遭到国社党内反

对民盟分子的反对。他们说我非国社党员，没有参加大会的资格。张君勱说先参加大会然后再办入党手续。我于是以非党员的身份参加了民社党的成立大会。在会上我同蒋匀田、孙宝毅等抵制了反对民盟分子的发言，使得民社党终于在那次会上未能做出退出民盟的决议。作为民盟的忠实成员，我尽了暂时在民社党的会上捍卫民盟的责任。会后他们叫我办理入党手续，我的目的既已达到，我当然就置之不理了。

（3）我参加了政协秘书处的工作

重庆的政协除了参加进去的五个方面各派若干代表组成而外，另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和青年党各出一人组成秘书处。代表国民党的是雷震，代表共产党的是齐燕铭，代表民盟的是蒋匀田，代表青年党的是刘东岩，雷震任秘书处处长。秘书处本身并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各方面的秘书只是协助各该政协代表团工作。

张君勱在当年8月间虽然在民社党成立会上抵制住了退出民盟的动议，但会后他受到党内反民盟势力的压力，越来越在民盟内部闹独立性。9月间他给民盟写了一封信，说以蒋匀田为民社党驻民盟的代表，民盟发表任何公开文件须事前经过蒋匀田的同意。这样一来岂不是要叫蒋匀田作民盟的太上皇了吗！当时梁漱溟作为民盟的秘书长认为蒋匀田只能是代表民社党参加政协秘书处而不适宜代表民

盟了，于是改由我担任民盟政协代表团的秘书。从此，第三方面（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政协代表们开会的时候，作为秘书代表民盟的除了蒋匀田而外还有我。

1946年10月是国共两党和谈活动的高潮月。从10月下旬开始，第三方面的政协代表们每天上午在南京交通银行开碰头会，讨论和谈问题。梁漱溟10月底代表第三方面拟出一个荒谬的和平提议方案，分别送到国、共和美国三方。这是违反中共和民盟之间早已拟定的双方关于和谈有什么重要决定要事前相互关照的默契的。当梁漱溟、李璜和莫德惠将这个方案送到中共遭到周恩来的严肃斥责时，这个方案已送到国民党代表孙科方面去了。这个方案在孙科手里还未送到蒋介石之前，终于及时地收回来未铸成大错。据梁漱溟事后对我说这是应归功于李璜的。这个文件业经第三方面全体代表签过名，送出去的东西收回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李璜说他负责说服青年党不反对这件事。对一个已经依附国民党的青年党人来说，毕竟不能不说是做了一件好事。经过这一曲折，梁漱溟于是退出了和谈，离开了南京，最后终于脱离了民盟。

在我参加政协和谈活动的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民盟违反同中共事前相互关照默契的另有第二件事。11月12日是国民党原定召开伪国大的日期。伪国大一召开，则和谈就不可挽回地破裂。到了11月初，中共固不待言，第三方面各单位的国大代表名单也都未提出。这时候，国民党向第

三方面表示：只要第三方面肯于提出国大名单，国民党方面就可以考虑延期召开国大，继续和谈。11月11日清早，李璜到张君勱处二人商量想出这样一个方案：由第三方面联名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将国大延期一个月，继续和谈，按照政协决议程序先改组政府，然后第三方面保证提名出席国大。张君勱将这样一个拟议带至民盟总部讨论，当时出席的人除民盟政协代表（张澜、梁漱溟、张东荪不在南京未出席）而外，民盟在南京蓝家庄总部的中委也都参加。会上虽有人（我记得是李相符）对规定这样一个日期会不会把自己套进圈子提出怀疑，但奇怪的是竟没有一人提出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应不应向中共打个关照以符合自己同中共之间的默契。大家议论纷纷，但没有人提出坚决不同意的意见。于是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张君勱、蒋匀田和我遂一同到了交通银行（第三方面每天上午10时在那里碰头）。李璜把拟好的信件匆匆读了一遍之后，大家没有异议地全体在上面签了名。按照过去，这种文件只是政协代表才在上面签名。这次扩大范围破例允许各单位出席的政协秘书也都可以上面签名，因此我的名字也签在上面。这时候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位中共代表也来到了交通银行。中共代表们知道第三方面每天上午在这里碰头，他们一般也每天到这里来同大家通通气。更加不能原谅的是，当着周恩来等的面，大家对这样一件大事只字不提，等周恩来走了之后，立刻把签好的信交给

社会贤达方面的代表准备当天送交蒋介石。幸而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三人在交通银行散会之后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告知此事，发现了这是一个圈套，赶在信件还未送出之前，把签在信上自己的名字涂了去，使这封信不能送出。这个圈套落了空，第三方面次日（11月12日）上午在交通银行碰头得悉此事之后，左舜生气急败坏地对着民盟的代表说：“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陈启天也接下去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周恩来这时也到交通银行向第三方面辞行，说伪国大召开（蒋介石宣布将伪国大由12日延至15日准时召开），和谈已经破裂，自己准备返回延安。周恩来针对左舜生、陈启天的叫嚣义正辞严地反驳说：“鸡吃人民的粮食。牛帮人民生产粮食，而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当牛是光荣的，当鸡口是可耻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说得青年党人哑口无言。李维汉针对罗隆基那些天同国民党雷震密切往来的情况也进行了严肃的指责。所谓第三方面交通银行的聚会从此结束。1946年11月15日伪国大召开了，从当年1月开始的政治协商会议彻底破产，国内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4）参不参加伪国大的斗争

在11月12日第三方面最后一次碰头会上，左舜生代表青年党正式宣布，“青年党准备参加国民大会”。民盟张

澜主席彼时远在重庆迄未参加当时的和谈活动，他自重庆亲自打长途电话给南京民盟总部坚嘱反对参加。民盟在当日会上发表了一个如下的书面声明：“民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的依据。同人愿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以前，决不参加。’”张君勱当时表示在民社党内部讨论后再决定是否参加。在一个短时期内张君勱处在左右夹攻之中。民社党中蒋匀田拼命劝说参加。国民党方面也一再添价钱，通过张君勱的弟弟张公权以家庭的关系向张君勱进攻。社会舆论方面以郭沫若为代表努力制止张君勱参加，郭老甚至跑到张君勱的家拥抱着同张君勱接吻。我在其中也尽了绵薄之力，劝说张君勱不能抛弃民盟而断送自己的前途。11月16日张君勱写了一封信给张东荪，叫孙宝刚（民社党中常委）和我带到北平约请张东荪到南京开民社党会讨论是否参加。我在上面说过我并不是民社党员，但我同张东荪如同我同张君勱那样有师生的关系，因此叫我同孙宝刚一道去。对于我来说，参不参加国大是一个重大政治立场问题，是没有讨论余地的。我当时立刻表示拒绝去。在当天晚上周恩来来到蓝家庄民盟总部辞行的时候，我对他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立刻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呢？假如你不去，叫孙宝刚一个人去，张东荪就非常可能来南京。张君勱的参加国大是肯定的了，何必再拖一个张东荪下水

呢？你去北平可以做一点张东荪的工作嘛。”我听了这个指示之后马上去找张君勱表示愿意前往。张君勱当时还非常高兴，以为我转变了立场，而没有料到我去拆他的台。我同孙宝刚于次日一同飞到北平，约好第二天我们一道去燕京大学见张东荪。飞机抵达西苑机场，孙宝刚搭民航汽车进城。我对孙说要到附近一个亲戚家去一趟，而实际上我就近一个人先到了燕京大学去找张东荪。我对他介绍了南京的形势，叫他万万不能去南京。就这样，我和孙宝刚第二天去见张东荪的时候，张东荪表示不能去南京，并写了一封回信由我带交张君勱，其中有“民社党交出名单之日，即我事实上脱离民社党之时”的明确表示。他并写了一封信寄给张公权，提到“君勱四十年声名不易得，望有以全之”。附带在此补述如下一点插曲：在我到达北平的第二天，蒋介石给张东荪打来一个电报，约请张到南京参加国大。张东荪回了蒋一个电报推说有病无法到南京，但又加了这样一个尾巴，说希望大会能通过一个民主宪法，中共纵不参加大会想亦必拥护。我知道之后立刻对张东荪说万万要不得，一个非法（违反政协决议）片面召开的大会所通过的任何东西，不但中共不会拥护，民盟也决不会拥护的。但电报稿子已经送电报局了，怎么办呢？于是张马上叫他儿子坐一辆出租汽车赶到电报局，幸好电报还未打出，及时地把那段尾巴删掉。我在北平呆了三天之后就回到南京。

总观以上这一阶段，我一直在政治上同张君勱搞在一起，其中甚至积极帮助他做过丧失人格和国格里通外国的勾当，如上述写信给美国总统杜鲁门。最后在参加伪国大这一关头上我同他决裂了，从此同他断绝政治关系。

（四）伪国大召开之后至民盟被迫解散之前

伪国大召开了，民盟拒绝参加。11月12日沈、章、张在第三方面写给蒋介石的信上把自己名字涂掉使其失效，今天从政治观点来论，这一举动挽救了民盟，使其没有陷入圈套，搞到日后不得被迫拖进伪国大。但在当时的影响上看，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副作用。这件事同半月前梁漱溟代表第三方面向国共两方提出的和平方案经中共方面的反对而又撤回，从形式上看虽是一样，但却有以下两点的不同：（1）梁的和平方案直接牵涉到中共方面而这次给蒋的信却完全属于第三方面的事；（2）撤回梁的方案经过第三方面各方的同意，而这次则只是沈、章、张三人的事。尤其是张申府在第三方面碰头会上讲的方式也太不策略，明明白白地说是“签名之后我们三人去见恩来，他不同意这一举动，因而我们转回来把名字涂掉”云云。这就给青年党、民社党及一些反共、反民盟的人们以借此攻击民盟的口实。于是一个短时间内，什么“遇事请示”，“尾巴”，“没有独立立场”等等连篇累牍地在京沪